

日本汉学家
「近世」中国研究丛书



的密码

——社会语境中的宋代文学

「日」浅见洋二 著
李 贵 赵蕊蕊 等译 李 贵 校译

百川日夜逝，物我相随去。惟有宿昔心，依然守故处。

——苏轼《初秋寄子由》

復旦大學

日本汉学家

『近世』中国研究丛书

朱刚 李贵 主编

文本的密码

——社会语境中的宋代文学

〔日〕浅见洋二 著

李贵 赵蕊蕊 等译 李贵 校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本的密码——社会语境中的宋代文学/[日]浅见洋二著;李贵、赵蕊蕊等译;
李贵校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 8

(日本汉学家“近世”中国研究丛书/朱刚, 李贵主编)

ISBN 978-7-309-13082-9

I. 文… II. ①浅…②李… III. 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宋代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52087 号

文本的密码——社会语境中的宋代文学

[日]浅见洋二 著 李 贵 赵蕊蕊 等译 李 贵 校译
责任编辑/王汝娟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出版部电话: 86-21-65642845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

开本 890 × 1240 1/32 · 印张 10 字数 221 千

201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3082-9/I · 1049

定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序 言

文学作品的文本不能单靠自身而存在，其生成、接受、传播离不开人类社会及由之构成的社会圈域，它存在于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中。换句话说，文学作品的文本是依托于各种各样的社会语境而存在的。本书由笔者最近十年来所写的以宋代为主的有关中国古代文学的十四篇论文汇集而成，各篇之间原本并无一贯的问题意识。如果非要找出关联性的话，上述的问题意识或可说是一条贯穿本书的线索。在此问题意识下，笔者试图对中国古代的文学文本的社会存在形态进行探究。

本书由第一编“权力控制下的文学创作”、第二编“从‘公’文学到‘私’文学”及第三编“文本生成论”组成。以下对各编概要及基本问题的设定作一陈述。

第一编：权力控制下的文学创作

简单地说，中国古代社会具有皇帝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权力构造。文学文本的作者，同时也是读者，这些知识分子大多作为官僚士大夫被编入这一权力构造中。

在以皇权为顶端的社会中，知识分子创作出的文学文本以怎样的形式存在？再者，文学与皇权之间缔结着怎样的关系？当然，这些问题有必要从多个视角进行考察，而本编仅从以下一点来界定问题的考察范围，即文人与国家统治权力发生冲突、倾轧之际，他们采取怎样的形式来发表言论、进行创作活

动？第一章：《“避言”——从〈论语·宪问〉论中国古代的言论与权力》、第二章：《言论统制下的文学文本——以苏轼的创作活动为中心》、第三章：《文本与秘密——再论言论统制下的文学文本》以孔子、苏轼为例，结合他们的言论或创作活动，对上述问题进行考察。

第四章《诗人之梦，诗人之死——以苏轼与郑侠的故事为中心》是围绕有关苏轼、郑侠的宋代小说的形态而作的考察随笔。因为此专题也是以遭受国家权力镇压的知识分子为中心而展开的，所以一并收入本编。

第二编：从“公”文学到“私”文学

从“社会语境”“社会存在形态”的角度来看，最有效的论述途径应是“公”和“私”的二元对立模式。假如将中国古代文学分为强调“公”和强调“私”两种文学样态，如何说明这两者的区别？虽然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但或许可以依据文学与皇权的距离来加以说明。也就是说，距离皇权近、与皇权密切相关的是“公”的文学，与之相反的则是“私”的文学。

第一编主要论述“公”的文学，而本编探讨的是与之相对的“私”的文学，主要从“儿童”“童年”“故乡”“田园”“老年”等话题展开，对宋代苏轼、陆游、杨万里等人的作品作了相关考察。

第五章《中国诗歌中的儿童与童年——从陶渊明到陆游、杨万里》追述从陶渊明到杜甫、白居易，再到北宋苏轼、黄庭坚，南宋陆游、杨万里在描写“儿童”和“童年”时的文学表现。第六章《儿童的情景，或田园的忧郁——关于杨万里的诗》是一篇论述有关杨万里歌咏儿童和田园的随笔。第七章《“眼中历历见幽风”——陆游诗中歌咏的农村》、第八章《刘克庄与故乡田园》分别对陆游和刘克庄诗中“故乡”“田园”“老年”的话题进行了考察。

在中国强调“私”的观念的文学中,田园、山水的风景是非常重要的话题。朝廷是“公”的世界的代表,所在地是人工的都市。与之相对,“私”的世界则是自然的田园、山水。第九章《杨万里与“诗债”》、第十章《苏轼与杨万里诗中山水的拟人化》主要考察苏轼和杨万里诗中山水、田园的表现及其特质。

第三编:文本生成论

简单地说,文本有各种各样的文体。根据“公”“私”二元对立模式,也可以区分出不同文体的文本。例如,献给皇帝的奏表是“公”的文本,而写给亲友的尺牍则是“私”的文本。但是,本编所讨论的并不是因文体的差异而形成的“公”与“私”的差别,而是同一文体中的“公”“私”差别。以诗歌文本为例,在此类文本中,既有强调“公”的观念的文本,也有强调“私”的观念的文本。

结合诗歌文本的形成过程考虑:诗人的脑海中最先浮现诗句,不久诗人就会完成一篇诗歌作品,并将之写在纸上。所记录的诗歌文本或被放置在诗人手边,或被赠与亲友。这一阶段的诗歌文本,仅有极少数的读者,其“私”的特征也极为强烈。但是不久这类诗歌文本就会被收入诗集,拥有相对广泛的读者,逐渐开始向“公”的方向变化。本编所论述的是,诗歌文本在从“私”转向“公”的生成过程中的各种样态。

第十一章《“焚弃”与“改定”——宋代别集的编纂或定本的制定》结合唐宋文人事例,主要考察放置在作者手边的诗歌文本被“改定”,或被“焚弃”的现象。第十二章《从校勘到生成论——有关宋代诗文集的注释特别是苏黄诗注中真迹及石刻的利用》着眼于南宋产生的苏轼、黄庭坚诗注中诸多关于苏黄墨迹和石刻的记载。墨迹、石刻文本是被整理成诗文集前的“私”的文本的典型。本章主要列举与这些文本相关的注记资

料,继而考察其中所显示的文献学、文学论的特质。第十三章《黄庭坚诗注的形成与黄耆〈山谷年谱〉——以真迹及石刻的利用为中心》在前章的基础上,考察黄庭坚诗注和年谱中所见的有关其墨迹和石刻的记录,并以此来明晰黄诗各种注本的形成过程。第十四章《宋代文本生成论之形成——从欧阳修撰〈集古录跋尾〉到周必大编〈欧阳文忠公集〉》结合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和周必大所编《欧阳文忠公集》校注,对第十二章、第十三章论述的问题再加以深入探讨。

本书意在考察中国近世文学文本的社会存在形式,所收各章原本是各自独立的专题,各章间或有诸多重复之处。原本想在汇总成书时,对重复之处作相关整理,但始终未能如愿。敬请谅解!

目 录

序言 / 1

第一编 权力控制下的文学创作

第一章 | “避言”

——从《论语·宪问》论中国古代的言论与
权力 / 3

第二章 | 言论统制下的文学文本

——以苏轼的创作活动为中心 / 20

第三章 | 文本与秘密

——再论言论统制下的文学文本 / 67

第四章 | 诗人之梦,诗人之死

——以苏轼和郑侠的故事为中心 / 96

第二编 从“公”文学到“私”文学

第五章 | 中国诗歌中的儿童与童年

——从陶渊明到陆游、杨万里 / 107

第六章 | 儿童的情景,或田园的忧郁

——关于杨万里的诗 / 130

第七章 | “眼中历历见幽风”

——陆游诗中歌咏的农村 / 135

- 第八章| 刘克庄与故乡田园 / 144
第九章| 杨万里与“诗债” / 155
第十章| 苏轼与杨万里诗中山水的拟人化 / 174

第三编 文本生成论

- 第十一章| “焚弃”与“改定”
——宋代别集的编纂或定本的制定 / 197
第十二章| 从校勘到生成论
——有关宋代诗文集注释特别是苏黄诗注中真迹及石刻的利用 / 227
第十三章| 黄庭坚诗注的形成与黄蓍《山谷年谱》
——以真迹及石刻的利用为中心 / 262
第十四章| 宋代文本生成论之形成
——从欧阳修撰《集古录跋尾》到周必大编《欧阳文忠公集》 / 293

致谢 / 311

【 第一编 】

权力控制下的文学创作

第一章 “避言”

——从《论语·宪问》论中国古代的言论与权力

在中国古代，文人常常因其言论与创作活动而与国家的统治权力发生冲突，乃至因言获罪，遭到打压。例如在北宋时期，被卷入新旧党争中的苏轼，就因以诗毁谤朝廷的罪名被御史台告发，遭到贬谪（乌台诗祸）。而在知识分子当中，最早如此与国家权力发生冲突的当为孔子。孔子往往给人留下安稳地遵从体制的印象，然而在当时他却是一位反对政治体制的叛逆之人，是一位反体制的知识分子。事实上孔子后来也被迫离开鲁国流浪四方，去寻找认同自身思想的为政者，并在此期间屡次身陷险境。他的遭遇，当是其言论拒绝谄媚、拒绝屈从于当时的政治权力使然。可以说，孔子正是在权力与言论冲突摩擦的漩涡中成功幸存的知识分子。

当个人言论与国家权力发生冲突之际，知识分子应当如何行事？对此，《论语·宪问》提出了“避世”“避地”“避色”“避言”四种方式，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避言”。“避言”所指究竟为何？本章通过探讨历代对于“避言”的解释，致力于阐明孔子的言论观之一端。并在此基础上联系《韩非子》《管子》等著作，考察中国古代言论与权力的关系。

一

首先，试举《论语》中几处论及国家的统治权力与思想言论之关系的有代表性的章句，例如《宪问》篇中有云：

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①

据包咸注可知，“危”即“厉”，又据何晏集解可知“孙”即“顺”。“孙”通“逊”。这是说：国家若有“道”（即道义、道德），“言”（即言论）和“行”（即行为）均可激烈；然而国家若无“道”，“行”仍可以激烈，而“言”则应谦顺。换言之，孔子此篇的论述，可作如下观（此处撇开“行”不谈，仅以“言”而论）：若国家实施善政，则言论可以直截不迂曲，也就是可以直接提出批评意见；与之相反，若国家政治黑暗，言语则须谦顺，批判亦应有所收敛。“危言”也即“直言”，“言孙（逊）”则是与之正相反的“曲言”。而在中国的言论环境中，可以说“言孙”“曲言”更注意修辞，更多地具有所谓文学式的委婉表达。^②

除此之外，《论语》中尚有不少地方将国家是否有“道”作为言论和行动变化，或是有必要随之变化的依据。例如《公冶长》篇中有云：

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

卫国的大夫宁武子在国家有道时便表现为智者，在国家无道之时则表现为愚者（孔安国注有“佯愚”之说）。孔子称赞这一处世方式。而这与表现为智者时言“危”，表现为愚者时则言“孙”的指向也基本相同。

从以上所举的两篇中可以看出，对孔子而言，自己所仕之国是否有“道”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或许“言危”“言孙”两种选择都会被认为是在体制内的护位保身之说，然而这样的解释是不恰当的。孔子所关心的恐怕不是自己在体制内的位置（换

① 本章《论语》及其古注的引用据《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本，嘉庆二十年重刊宋本，中文出版社影印，1971年。

② 《汉书》卷六四下《贾捐之传》中有“危言”一语，颜师古注云：“危言，直言也。”另《子华子·阳城胥渠问》将“直言”与“曲言”加以对比，称“太古之圣人，所以范世训俗者，有直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贡也。曲言者，假以指喻也”。

言之也即“发言权”)能否得到保证,因为他认为若身处无“道”之国,即便能保证自己的地位也毫无意义。正如《宪问》篇中的其他章节所谈到的那样:

邦有道穀,邦无道穀,耻也。

此外《泰伯》篇亦云:

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概而言之,孔子希望表达的应是:身处有“道”之国,则不惜生命为之建言献策;身处无“道”之国,则无须为之效力。也就是说,孔子以自身的言论为立足点,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值得为之奉献,是否值得为之提出批评意见。可以说通过这段文字,为言论而死的孔子作为思想家的胆力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孔子对于自身坚守的“道”,也就是思想、言论的正确性抱有强烈的信念。这一点在上文《泰伯》篇“守死善道”一句中也有所体现。在此之外,《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所记载的孔子与众弟子在遭遇陈蔡之难时的问答也反映了这一点。孔子问众弟子:“吾道非耶?吾何为于此?”众弟子对此有各种各样的回答,而孔子最赞赏颜回以下的答案:“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①由此可见,孔子最在乎的是矢志不渝地守护自己的思想、言论。

那么,在面对“道之不行”的混乱政局时,从事言论活动的知识分子或思想家们应当如何应对?《宪问》篇中的以下一句

^① 《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1932页。

值得注意：

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①

“辟”通“避”，即避免或远离接触。本句的内容，一言以蔽之，是论述“贤者”——有德行的知识分子——可从“世”“地”“色”“言”四个层面出发来切断与国家、社会的联系。这其中反复使用了“其次”一词，从而构成了一种“层叙法”，可以理解为它是依据切断层级，从高到低、从大到小排列的。也有学者认为此句是评判人物的优劣，划分出最高层次的贤者、第二等贤者、第三等贤者等，兹不取。^②

“辟(避)世”(本章中，以下无必要区分之处用“避”字)指的是断绝与世界的联系。所谓“世”，指的应是那一时代人类社会之总体。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理解为论述的是成为隐者，也就是“隐逸”；接下来的“避地”，可以理解为避开政治混乱的国家，也即移居到别国。所谓“流亡”恐怕也包含在此。以上两者在解释上几乎没有产生异说的余地，历代解释也都基本一致。但对于“避色”“避言”的含义，历代解释则有所出入。

对于以上所引《论语·宪问》的内容，尤其是“避色”“避言”的部分，历代是如何阐释的呢？笔者首先从中国近年来有代表性的译注出发加以确认。《论语》的译注本汗牛充栋，此处仅举三例，首先为钱穆的《论语新解》：

贤者避去此世。其次，避开一地另居一地。又其次，

① 在这一节之后孔子说道“作者七人矣”——实践了以上准则的有七人。关于这一点本章不论及。

② 朱熹《论语集注》引程子言：“四者虽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优劣也。所遇不同耳。”在此基础上王夫之的《读四书大全说》卷六云：“以优劣论固不可，然固必有次第差等矣。……就避之浅深而言也。”本文赞同这一解释。

见人颜色不好始避。更其次，听人言语不好乃避。^①

在此“避色”被释为“见人脸色不好而避”，“避言”被释为“听人言语不好乃避”。而杨伯峻《论语译注》的翻译如下：

有些贤者逃避恶浊社会而隐居，次一等的择地而处，再次一等的避免不好的脸色，再次一等的回避恶言。^②

“避色”被译为“避开不好的脸色”，“避言”被译为“回避恶言”。那么“色”“言”到底是谁之“色”、谁之“言”呢？钱氏和杨氏对此皆未予以说明。或许二人的解释并未限定于某一具体的个人，而是指广义上的他者的恶颜恶语。此外，杨氏将反复使用“其次”之语的“层叙法”解释为区别人物的优劣等级，这一差异因与本章主旨无关，在此不展开论述（下文所举例子同此）。

再举黄德信主撰，周海生、孔德立参撰的《论语汇校集释》为例。黄德信的按语如下：

避，去而不遇也。避世，谓隐居，厌世也。避地，去其所厌之地。避色，避见其所厌见之容色。避言，远去而不闻其言。^③

黄氏在此处亦未特别指出是谁之“色”、谁之“言”。尽管黄氏所解也有可能指广义上的他者之“色”“言”，然而由于开头部分“避，去而不遇也”似指离开君主的身边，因此黄氏或许理解为是君主之“色”“言”。

那么，近年来日本学界对此有何解释呢？兹从数量众多的译注中选出有代表性的四种加以考察（此外，还有不少重要译

① 新校本《钱穆先生全集·论语新解》，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442页。原著初版由香港新亚研究所出版，1963年。

② 《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157页。

③ 《论语汇校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327页。